

新中国舞蹈教育的历时性脉络以 1949——2000 年的舞蹈教育发展为例

赵一帆

山西开放大学，山西省太原市，030032；

摘要：自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当代舞蹈已走过 70 个年头。70 年的历程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每个阶段都呈现出各自鲜明的特点：第一阶段，共和国之舞的奠基（1949-1960）；第二阶段，在曲折中前进发展（1960-1976）；第三阶段，经典范式的扬弃（1976-1980）；第四阶段，艺术院校舞蹈比赛的蓬勃开展（1980-2000）。不同时期呈现出的面貌和特征共同构成共和国舞蹈艺术的精彩风景。

关键词：舞蹈教育；新中国；历时性脉络

DOI:10.69979/3029-2735.24.11.042

自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以来，舞蹈和舞蹈教育在这几十年间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这一时期的舞蹈教育和人民的政治生活息息相关。但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在讲述现代中国的舞蹈教育时，笔者将会以时间轴为脉络，去回顾那时候舞蹈教育的曲折发展。

这一时期的舞蹈教育可以按时间分为四个部分

1 共和国之舞的奠基——精英育才 1949-1960

1.1 历时性脉络

新中国现当代舞蹈事业的演进轨迹，与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构建起的专业舞蹈教育体系存在着紧密且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内在关联。从历史发展脉络审视，50 年代在多元复杂历史要素交织、催化下应运而生的舞蹈教育格局，实质性地形塑了 20 世纪下半叶整个中国舞蹈事业的基本风貌与宏观走向。

回溯往昔，在革命战争的烽火硝烟岁月里，囿于动荡时局、资源匮乏等诸多客观局限，开展正规化、系统性的舞蹈教育几近奢望。新中国成立伊始，舞蹈教育事业起步之际，面临着从非专业化的舞蹈研习范式向规范严谨的课堂教学模式全方位转型过渡的艰巨任务。彼时，专业化舞蹈教学萌芽初现，多以培训班这类灵活机动的组织形式登上历史舞台。当专门化的舞蹈学校尚未被正式提上筹备议程之时，50 年代的舞蹈培训实践已然呈现出蓬勃兴旺的发展态势。1949 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政治部于武汉创设部队艺术培训班，延请吴晓邦担任教员，该培训班先后成功举办两期，为新中国舞蹈

领域输送、培育了诸多专业人才，夯实了早期舞蹈人才储备基础。1951 年，中原大学文艺学院正式设立舞蹈组并开启常态化教学活动；同年 3 月 15 日，中央戏剧学院精心筹备开设舞蹈运动干部培训班，聚焦舞蹈干部素养提升与专业强化。至 1953 年，文化部特邀苏联芭蕾舞家奥·阿·伊莉娜来华执教，借此契机，世界芭蕾舞学派中极具影响力的俄罗斯学派教育体系被系统、全面地引入中国，与之相伴的，是苏联芭蕾舞艺术独特美学理念、作品编排范式的同步传播与浸润，拓宽了国内舞蹈从业者的艺术视野与创作思路。1954 年，北京舞蹈学校的创立无疑成为当年舞蹈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其影响力深远且持久。该校学员潜心修习苏联芭蕾舞教学体系中三年级课程，并研习中国古典舞等内容，学制长达五个月，实现了多元舞蹈文化与教学资源的深度融合与有机整合。值得一提的是，除上述专业化舞蹈教育机构外，彼时众多部队文工团及地方歌舞表演团体，亦积极投身舞蹈演员培训与教学工作，全方位、多维度发力，为新中国舞蹈事业培育了大批优秀表演人才，有力支撑了舞蹈事业的早期发展。

从教学方法论层面剖析，50 年代开启的专业舞蹈教育与中国传统歌舞教育模式存在本质区别。传统民间艺术传承多依赖“口传身授”路径，教学过程缺乏固定教材蓝本作为依托，动作规范标准模糊，艺术传承呈现出相对松散、随性的样态，舞艺在代际间更迭延续多凭借经验累积与实践体悟。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50 年代

专业化舞蹈教育,尤其以1954年北京舞蹈学校成立为显著标志,在吴晓邦、戴爱莲等先驱自20世纪20-40年代持续引入西方舞蹈教育思想与范式基础上,借助苏联舞蹈专家专业指导,芭蕾舞科得以组建,俄罗斯学派芭蕾舞教学得以系统铺陈,一举扭转延续数千年的“口传身授、师徒相袭”传统教学格局,搭建起具备坚实科学根基的现代舞蹈专业教育体系。此后,陆续涌现的各类舞蹈专业学校、高校舞蹈系科,与早期这批教育机构、培训班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历史渊源与传承脉络,它们共同勾勒、编织成中国现当代舞蹈教育多元共生、蓬勃发展的独特风景线。

1.2 舞运、舞研班的开展

在梳理中国舞蹈及舞蹈教育发展历程之际,20世纪50年代由吴晓邦亲自主持的中央戏剧学院“舞蹈干部培训班”(以下简称“舞运班”),无疑是其间最具标志性与深远影响力的关键存在,于舞蹈史脉络中熠熠生辉,值得深度剖析与阐释。

回溯至1949年第一次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召开之时,舞蹈界面临着专业定位与组织归属的抉择困境。彼时,正式代表人数稀缺,尚不满足成立独立协会的基础条件,在探讨舞蹈专业的隶属部门时,业内观点各异,或主张归置于音乐部门,或力荐纳入戏剧部门,最终鉴于多数人倾向,舞蹈专业落在戏剧范畴。此决策脉络为后续舞蹈在戏剧学院框架下的衍生发展埋下伏笔。

1950年,中央戏剧学院应运而生,华北大学三部舞蹈队顺势并入,旋即扩充组建为新中国首个专业舞蹈团。鉴于当时舞蹈行业整体呈现蓬勃扩张态势,在夯实普及根基之上实现专业水准拔升、培育编导与教员骨干力量,成为迫切需求。基于此,举办短期、高效且具针对性的训练班成为不二之选,全国性的“舞运班”应运而生,肩负起培育新舞蹈运动核心干部的历史重任。

“舞运班”课程体系多元且严谨,涵盖舞蹈基础技术课程,囊括自然法则下的身体律动、芭蕾经典范式以及中国戏曲舞蹈精髓等维度,旨在锤炼学员扎实的身体技艺与动作语汇;理论课程方面,文艺理论与舞蹈理论并驾齐驱,为学员架构起对艺术本质、舞蹈内涵的深度认知框架;创编实习课聚焦实践应用,助力学员将理论与技艺融会贯通,转化为创作实操能力;舞台美术、音乐、文学及相应文化课的开设,则旨在全方位滋养学员艺术素养,拓宽其文化视野,塑造综合审美能力。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吴晓邦于“舞运班”倾囊相授自身舞蹈艺术思想,其思想结晶《新舞蹈艺术概论》于1950年付梓出版,恰似理论灯塔,系统性总结其二十余载舞蹈艺术实践经验,深度剖析舞蹈艺术基本要义、特征本质,构筑起吴晓邦舞蹈思想核心大厦。书中精准锚定舞蹈作为“人体造型上‘动的艺术’”这一本质属性,围绕“动”字抽丝剥茧,深挖舞蹈造型、形象、形态、韵律等多元命题,阐释“动”在自然与社会生活双重语境下的规律呈现、现象表征,以及如何借由“动”传达个体乃至群体思想情感,明晰舞蹈艺术独特表意机制。

进一步探究,吴晓邦凝练提出“舞情、舞律、构图”舞蹈艺术“三大要素”论,巧妙关联呼吸与舞蹈表情、感情与舞蹈节奏、全新构图理念与舞蹈构图,丝丝入扣揭示舞蹈内在逻辑架构。其倡导“新舞蹈艺术”之“新”,深植于对“新的生活规律”洞察把握,将劳动人民新文化表现形式内化于舞蹈创作与审美之中,主张于自然与社会法则交织碰撞中探寻“动”之真理,突破旧有形式桎梏,激发崭新舞蹈艺术创造力。《新舞蹈艺术的初步技术教程》更是图文并茂,详述新舞蹈技术细节,针对人体训练难点、基本步法、表情传达以及多元舞蹈编排形式(双人舞、三人舞、组舞、群舞)给予实操指导,兼具理论高度与实践价值。

同期,在文化部与中央戏剧学院统筹擘画下,由朝鲜舞蹈家崔承喜担纲主持的“舞蹈研究班”(简称“舞研班”)亦璀璨登场,成为新中国舞蹈教育版图中另一重要拼图。崔承喜以其独特艺术魅力与卓越专业造诣,吸引全国莘莘学子汇聚麾下,传递朝鲜舞蹈美学理念、创作法则,在教学相长间,于学员群体中构建起对艺术形象理想标准的追求共识。“舞研班”成果斐然,不仅创演《中华民族大联欢》《虹》《母亲》《游击队》等契合本土情感与时代精神的佳作,还引入《乘风破浪》《假面舞》《农乐舞》《柴郎与村姑》等朝鲜经典剧目,多元文化碰撞交融,拓宽学员艺术表达边界。

岁月悠悠,那些早期舞蹈教育基地初创之艰辛、耕耘之劳苦,诸多细节或已隐没于历史长河,但不可否认,先辈们于简陋教学环境——或局促教室、或质朴草地操场,开启各舞种探索性实践,以无畏勇气与开拓精神,为新中国专业舞蹈教育夯基垒台、铺就坦途。吴晓邦所提出的系列舞蹈艺术基本概念与理论命题,历经近七十年风雨洗礼,依旧熠熠生辉,持续为舞蹈创作、教学、

研究提供基石支撑与智识启迪。“舞运班”学员恰似火种,携专业素养与创新理念奔赴全国,投身舞蹈艺术教育前沿、创作实践阵地、理论深耕领域、组织统筹舞台,成长为行业中坚力量,建功立业,书写新中国舞蹈辉煌篇章。

2 在曲折中前进发展——1960-1976 的舞蹈教育

新中国成立初期,舞蹈教育积极与全面性的文艺工作接轨,同步开启对艺术规律的初步探寻,由此,舞蹈创作领域与舞蹈教育体系呈现一派活跃景象,为行业发展注入蓬勃动力。彼时,众多舞蹈工作者满怀热忱投身其中,深入挖掘民族民间舞蹈富矿,秉持对本土文化艺术的深厚敬意与纯粹热爱,在创作实践与教学传承间,维系与捍卫了舞蹈艺术本真的纯洁质地。

然而,历史进程并非一帆风顺。大跃进时期,极左思潮汹涌泛滥,社会环境滋生出追求虚假繁荣的不良倾向,舞蹈艺术亦深受其扰。彼时,“一切舞蹈为政治目的服务”的理念被过度强化,仿若紧箍咒般禁锢着舞蹈家们的创作思维与艺术表达,极大程度上限制与规约了舞蹈创作的多元可能,成为制约行业健康发展的沉重枷锁。

更为严峻的考验接踵而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风暴骤起,中国舞蹈事业瞬间被卷入漫长且畸形的发展漩涡。首当其冲遭受重创的便是民间舞蹈艺术,在激进且错误的政治判定下,民间舞蹈无端被扣上“封建主义流毒”“小资产阶级闲情逸致”的帽子,遭致全面贬斥与打压,传承脉络几近断裂,无数蕴含深厚民族文化基因、承载民众质朴情感的经典舞目被迫尘封。

与之形成鲜明反差的是,源于西方宫廷的芭蕾舞,在特殊政治语境中被拔升至“革命样板戏”的尊崇高度。诸如《红色娘子军》《白毛女》等中国芭蕾舞剧,依托行政力量强势推行,步入大规模普及阶段,成为彼时舞台上的“特权”艺术样式,独享表演空间,而其他丰富多元的中国民族舞蹈形式则被全面禁止,常规自娱性舞蹈亦被视作“资产阶级享乐”行径而惨遭取缔,舞蹈生态失衡严重,艺术多样性被粗暴抹杀。

直至1972年,在周恩来总理关怀庇佑下,文艺创作稍显复苏迹象,涌现出《喜送粮》《水乡送粮》等佳作,为阴霾笼罩下的文艺天空带来几缕微光。但无奈时代风气积重难返,多数作品依旧深陷“政治图解”“概

念化演绎”的泥沼,创作者们背负沉重思想枷锁,难以施展艺术才情,作品沦为政治理念直白、生硬的传声筒,艺术感染力与审美价值大打折扣。

纵览现有文献典籍,虽囿于种种缘由,未能详尽铺陈“文革”期间舞蹈艺术所历经的惨痛遭遇,但对于亲身经历那场文化浩劫之人而言,往昔种种仿若噩梦,刻骨铭心。“破四旧”“打砸抢”“批毒草”的狂潮汹涌肆虐,无情冲垮了由中国民间舞蹈与世界优秀舞蹈文化构筑的坚实堤坝,舞蹈传承资料散失、演出场地荒废、教学体系崩塌;诸多杰出的舞蹈教育家、优秀演员蒙冤受屈,被下放农场,在繁重体力劳作中荒废艺术青春,曾经在前十年艰难萌芽、蓄势待发的艺术生命力,于极左思潮高压禁锢下扭曲变形,被迫绽放出“畸形之花”。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劫难,对舞蹈艺术的戕害全面且深重,给中国舞蹈事业留下难以磨灭的伤痛印记与发展断层,成为后世回顾、反思舞蹈发展历程时,一道无法绕开且令人唏嘘慨叹的历史伤痕。

3 经典范式的扬弃(1976-1980)

1976年金秋十月,历史迎来重大转折,中共中央雷霆出击,一举粉碎“四人帮”,消息如春风拂过华夏大地,全国舞蹈工作者满怀激奋,与亿万人民一同涌上街头,以澎湃的热情欢庆这一伟大胜利,长达十年之久的“文革”浩劫终告落幕。然而,阴霾虽散,思想领域的拨乱反正工作却荆棘丛生、任重道远,亟待一场触及灵魂、深入肌理的观念变革,以驱散积年沉疴,重塑正确认知。

伴随思想层面拨乱反正工作扎实推进、渐入佳境,文艺体制亦迎来新生契机,开启了从恢复往昔合理架构到系统性重新建构的转型历程,犹如破旧立新的宏伟工程,在时代浪潮中稳步启航,为后续文艺事业持续、稳健发展擘画蓝图、奠定基石。

4 全国艺术院校舞蹈比赛的蓬勃开展(1980-2000)

自“文革”极“左”思潮的阴霾被彻底驱散、积弊得以肃清之后,中国舞蹈艺术教育事业仿若春芽遇甘霖,在随后十年间焕发出蓬勃且强劲的发展活力,步入高速发展的黄金轨道。1978年4月,文化部直属诸艺术单位迎来重大历史节点,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国京剧院、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中央实验话剧院、

中央歌舞团、中央民族歌舞团、东方歌舞团、中国歌剧舞剧院、中央歌剧舞剧院等相继恢复往昔名称与建制，此番调整犹如基石归位，为整个艺术生态的复苏筑牢根基，亦为舞蹈教育事业重燃薪火、再启征程创设了稳定且积极的大环境。

在这股春风的吹拂下，北京舞蹈学校率先发力，一方面马不停蹄地投身于舞蹈艺术科系的梳理与重振工作，对既有舞蹈教材展开严谨细致、系统全面的恢复、整理与修订，力求去芜存菁、承旧启新；另一方面，于1978年10月1日，经国务院批准，成功改制为北京舞蹈学院，在陈锦清院长的领航下，实现了办学层次与规格质的跃升，开启中国舞蹈教育向高阶化、专业化、体系化迈进的崭新篇章，成为行业标杆与典范。

同年，原文学艺术研究院音乐舞蹈研究室舞蹈组顺势升格，正式更名为中国文学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室，这一机构更迭标志着舞蹈史论研究从零散、无序逐步迈向正轨，依托专业平台汇聚学术资源、凝聚研究力量，为舞蹈理论体系的深度构建、学术传承的赓续绵延筑牢制度根基，填补了过往理论短板，实现实践与理论并驾齐驱、协同发展的良好态势。

步入20世纪80年代中期，全国艺术院校“桃李杯”舞蹈比赛应运而生，恰似一颗璀璨明珠嵌入中国舞蹈教育版图，熠熠生辉。这场由北京舞蹈学院牵头发起，联合中国舞蹈家协会、中央电视台、文化部教育局共同主办的中国舞“桃李杯”邀请赛，于1985年8月25日至31日在北京盛大举行，此后以三年为周期定期举办，成为行业内固定赛事。其意义深远，不仅是对舞蹈教育成果的周期性检阅，更是健全教育体制、优化教学模式、加速人才孵化的关键引擎。通过搭建高规格竞技平台，激励各院校在教学内容、方法、师资培养等多维度精研深耕、创新求变，促使舞蹈人才如雨后天春笋般涌现，源源不断为行业输送新鲜血液，极大提升了舞蹈教育整体质量与影响力。

在“桃李杯”赛事开展得如火如荼之际，北京舞蹈学院芭蕾舞系亦未丝毫懈怠，全体教师紧锣密鼓筹备全

国第一届芭蕾舞比赛各项事宜。1985年2月12日至16日，这场汇聚国内顶尖芭蕾力量的赛事在北京如期举行，主办单位囊括北京舞蹈学院、文化部教科司、辽宁北国音像制品出版社，参赛单位涵盖中央芭蕾舞团、上海芭蕾舞团、辽宁芭蕾舞团、上海舞蹈学校、北京舞蹈学院及其附属中等舞蹈学校等行业翘楚，吸引正式选手70名同场竞技。赛事的成功举办，仿若一面旗帜，引领国内芭蕾界切磋技艺、交流互鉴，有力推动了中国芭蕾舞事业专业化、规范化发展，促进芭蕾艺术在华夏大地生根发芽、茁壮成长，彰显出中国舞蹈事业多元共进、蓬勃向上的繁荣盛景，也为后续舞蹈艺术在国际舞台崭露头角、绽放华彩奠定坚实基础，激励着一代又一代舞蹈人砥砺前行，续写辉煌篇章。

5 结论

历经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砥砺前行，尤其是在近四十年社会主义建设蓬勃开展与改革开放持续深化的宏大历史进程中，中国新舞蹈艺术教育依托丰富多元的教学实践场景，持续深耕细作，不懈探索创新，系统归纳总结，逐步构筑起一套契合中国社会主义舞蹈事业发展诉求、彰显鲜明中国特色的舞蹈教育体系。

参考文献

- [1]王克芬、隆荫培：《中国近现代当代舞蹈发展史》，第182—183页。
- [2]“舞蹈运动干部训练班”（简称“舞运班”），由中央戏剧学院于1951年3月在北京设立，吴晓邦担任班主任。
- [3]“崔承喜舞蹈研究班”（简称“舞研班”），由中央戏剧学院于1951年3月在北京设立，朝鲜舞蹈家崔承喜担任班主任。
- [4]王克芬、隆荫培：《中国近现代当代舞蹈发展史》，第205页，第208—209页。

作者简介：赵一帆，（1998.7-），女，汉族，山西省太原市，山西开放大学，助教，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音乐与舞蹈学。